

论畜牧业经济

扎 舍



6.3

四川民族出版社

87
F326.3
23

论畜牧业经济

扎 舍〔藏族〕

四川民族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成都

责任编辑 严毓祖
封面设计 曹辉禄
技术设计 席伟

论畜牧业经济

扎舍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5.625 插页8 字数119千
1986年11月第一版 198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420 册

书号: 16140·22

定价: 1.63元



1. 扎舍同志在联邦德国考察畜牧业（右三为本书作者扎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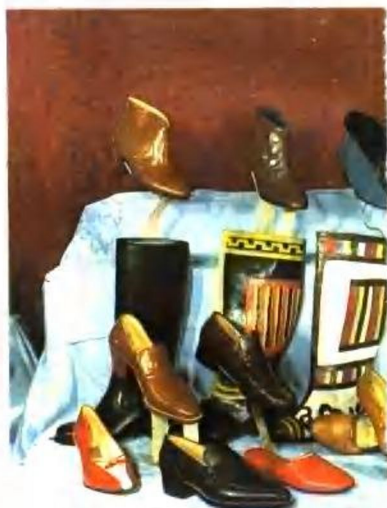
2. 图为峨边县畜牧局牧草资源调查标本室。



3. 图为康定毛纺厂。



5. 雪山下林间草地的牦牛群



6. 阿坝州制革厂产品。



纺织车间



4. 四川省红原县瓦切牧场的
奶牛,最高日产奶18.1斤。



7. 阿坝州红原奶粉厂外貌。



8. 九龙牦牛 (母)

9. 阳平种牛场饲养的77号母牛，曾以年产奶8000公斤的记录，获全国西门塔尔牛“冠军”。



11. 藏系绵羊群



10. 凉山彝族自治州畜科所试种的白三叶间种玉米，均获丰收。

序 言

蒋民宽

中国现有农业结构必须改革，农业结构中畜牧业的比重应该大大地增加。对四川来说，应该是更有条件发展畜牧业的。其理由如下：

一，四川拥有一亿六千万亩草原，数千万亩草山草坡以及许多饲料种植地。粮食生产的发展，还会为发展畜牧业提供更多的饲料。

二，从气候条件来讲，四川省地处亚热带，因东西海拔差异大，其气候类型多样，地区差异明显。一方面，具有不同生态环境条件，可适应不同牲畜的饲养；另一方面，大部分农区、半农半牧区可以种植某些优良品种的饲草、饲料作物。

三，在畜种方面，不但有优良的地方原生品种的牲畜，而且已经引进和正在引进一批适生性强、生产性能好的优良品种。

四，我省已有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可以为发展饲料工业和畜产品加工提供必要的设施和装备。

五，人民群众有发展畜牧业的强烈愿望。广大农牧民有饲养牲畜的丰富经验，并掌握了一定的畜牧科技知识。

札舍同志有志于此，为此锲而不舍数十余年，既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又远渡重洋搜罗考察，实践经验丰富，并不断在理论上进行探讨。多年来，在论述畜牧业经济方面发表了不少文章，谈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今天，四川民族出版社汇集成册为《论畜牧业经济》，将它展现给大家，相信将对我省畜牧业的发展起到促进和指导作用。

希我省及各方有志之士能够从中有所裨益和启发，共同努力，以成我省畜牧业的大发展。

一九八五·七

目 录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不断发展	1
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大力发展畜牧业生产	11
对四川发展畜牧业生产潜力的探讨	21
“七五”期间发展四川畜牧业之管见	32
对畜牧业经济转轨的商讨	38
从西德畜牧经济结构看四川畜牧业的发展	46
如何发展牧区、半牧区的经济	67
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畜牧业的几点看法	71
谈谈发展商品猪的经济规律	76
如何搞好我国半细毛羊育种工作	99
谈谈进口长毛种羊的饲养繁殖和绵改育种	106
努力发掘畜牧业内涵潜力	116
试论“三州”畜牧业经济	127
草原建设和畜牧业经济初探	144
畜种改良试探	153
种畜场站的地位和作用	163
后 记	172

本书照片系四川省农牧厅畜牧局、凉山州畜牧局、阿坝州计经委、甘孜州计经委、峨边彝族自治县、阳平种牛场供稿。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要在 实践中接受检验和不断发展

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据这一认识现实，领悟真理的哲学命题，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不断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经济理论依据；唯物史观揭示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指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蓝图，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不可能预先具体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异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是直接的社会生产，产品的分配是直接的分配，既不转换为商品，也不转换为价值。并推论一旦消灭了私有制，生产资料归社会所

有，商品生产即将消亡，个人劳动将直接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份。“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①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却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设想大不相同。在所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里，都毫不例外地存在着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且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建立起来，而是在自然经济占优势的苏联首先出现。历史的突破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

列宁在早期也完全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可笑的”。苏联十月革命初期，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采取这一措施同列宁认为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认识有密切关系。由于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在实践中行不通，客观上要求纠正理论上的错误和扭转经济的实物化进程，只好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一九二一年秋天，列宁曾公开说：“我们原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指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他承认在特定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的必要性。列宁这一思想和政策的转变，使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摆脱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困境，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可惜列宁逝世过早，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只有几年，所以直到列宁逝世前仍坚持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产品不是政治经济学定义的商品。他没有也不可能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

义改造以后，商品经济的命运问题作出回答。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也强烈地打着产品经济论的烙印，他在肯定商品生产的必要性的同时，坚持产品与商品同时并存的论点。特别是长期实行农产品的“义务交售制”^②使苏联在粮食问题上吃够了苦头。到一九五一年，斯大林才承认，买卖和交换是集体农民唯一能够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不能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但是，他把生产资料这一大块排除在商品之外，并且提出要尽快把商品生产过渡为产品交换。可见，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属性的认识仍然是很肤浅的。这种“产品生产论”对苏联传统的经济体制模式有很大影响。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模式作了理论说明。他承认在两种不同的公有制还存在的意义上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承认价值规律的一定作用。而在许多方面，特别对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关系上，坚持一个大范围全国性“自然经济”观点，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作用，否定了交换和流通是独立的经济过程。

苏联在若干年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蒙上了一层阴影，失去了它应有的光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当资本主义各国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民生活随之有所改善的时候，苏联似乎逐渐减弱了它前进的动力。技术革新迟缓，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苏联的生产增长速度虽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但消费品远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品供应丰富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

对照。原先羡慕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看了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形，许多人发生了怀疑。这是不可掩饰的事实。其原因就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真正认识，经济理论违背了客观规律，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制约。

再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看，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付出代价，进行探索，通过鉴别，不断改进，逐步提高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较多地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对个体经济，主要是利用价格政策把它们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原则，组织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用来把他们的生产和流通纳入国家计划。给工商业资本家以合理的利润。那时国民经济中，国营企业已经占领导地位。在几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条件下，我们的国家计划事实上已经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起着支配作用。实现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因而，当时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较快，资产阶级也自愿接受改造，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初步得到发挥。

在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我们的头脑被欢呼声和锣鼓声弄得骄傲起来，似乎国家计划可以抛开客观经济规律而为所欲为。在“三年大跃进”时期，过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把客观经济规律抛到九霄云外，结果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生产被迫下降，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严重惩罚。

鉴于“一平二调共产风”的教训，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九年指出，生产资料可以当作商品卖给农村社队。他强调，价值规律是一所大学校。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主张发展商品生产。刘少奇同志提出过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等观点。陈云同志提出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六十年代初期，经过五年调整，取得了很大成绩，国民经济回到了正常轨道。但是，因为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没有从理论上论证得十分清楚，许多先进思想未能付诸实施。

在我国，不重视商品生产，急于搞产品分配，是有其历史根源的。革命前，自然经济在全国广大地区占统治地位，小农经济的思想有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这样就容易从传统观念出发去理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计划经济和自然经济混同起来，容易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是没有抽象劳动、价值、价格和货币等概念的自然经济。

我们在建国初期，受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是以产品经济为主体的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的思想影响，套用了苏联“老大哥”模式。过去在解放区和根据地办的工业、农场、商店也都是隶属于军队和当地政府的，带有供给制性质。全国解放后，我们的国营企业也好，大集体也好，都是“官办”的，实际上是属于政府所有的。在分配方面供给制的传统影响也一直沿续下来。对社会上的失业人员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就这样逐步形成了吃“大锅饭”的制度。在经济建设的速度上，我们追求

的是不切实际的高速度，搞的是高积累、大基建，使生产资料的供应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形成产品集中分配的趋势。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搞的是穷过渡，似乎越大越公越好，排斥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在经济决策方面，政企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企业缺乏生机和自主权。在调节体系方面排斥市场机制，管理方法主要用行政指令办法和用实物数量指标进行管理。在经济组织结构方面，搞的是大而全、小而全、条块分割、城乡分割。在分配原则上，实行的是平均主义。加之对外国际性经济技术联系很少，基本处于闭关自守状态之中。这些都是自然经济论在我国传统经济体制上的直接或间接反映。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则根本否定了一切客观经济规律。那些时候，把尊重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把社会主义商品制度，说成同旧社会差不多，是产生“走资派”、“新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强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样一来，全国急急忙忙使商品经济向产品经济过渡，违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完全脱离了我国国情，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灾难，国民经济走上了崩溃的边沿。

我们搞了三十来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很低。农村依然贫穷落后，自给半自给经济占着支配地位。城市由于物资供不应求，价格和价值严重背离，大部分产品只能统一调配和凭证供应，远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建立在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的经济基础上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

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又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指出：这个问题，“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摆脱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提出了一切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几年来，我们进行了农业体制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进行了许多试验和探索，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整个国民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提高。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决定》是指导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意义十分深远。

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改革，我国经济体制将会发生很大变化，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将从被压抑的僵化局面中解放出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生长自如、充满生机和活力、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我们的计划体制，将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改革用产品经济的办